

恰亞諾夫《農民經濟組織》述介

謝 美 娥

恰亞諾夫著，蕭正洪譯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1996 年 1 月，1 冊，271 頁

一、前 言

恰亞諾夫（Alexander Vasil'evich Chayanov, 1888-1939）《農民經濟組織》俄文原著於一九二五年出版，目前的譯本包括一九五七年的日譯本，一九六六、一九八六年 R. E. F. Smith 的英譯本，以及一九九六年蕭正洪的中譯本。不過，在此書問世之前，恰亞諾夫有關農民經濟理論較早且有體系的一本著作，應屬一九二三年德文版 *The Theory of Peasant Economy* 一書。一九二七年磯部秀俊把德文版翻譯為日文，以《小農經濟の原理》為名出版。但一九五七年，《小農經濟の原理》再版之際，磯部秀俊又以直譯自一九二五年的俄文版，出版了《農民農場組織》。¹ 然而，《農民經

¹ 英譯本題名 *A. V. Chayanov on the Theory of Peasant Economy*，為 Daniel Thorner, Basile Kerblay, and R. E. F. Smith 所編，一九六六年 Richard D. Irwin, Inc. 出版，並附有歐美各圖書館典藏 Chayanov 所有著作的目錄；一九八六年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英譯本出版時，增列了一篇 Teodor Shanin 的引介文章。至於日譯本，筆者目前並未找到。此處，筆者採閱的是中譯本。以上訊

濟組織》可說是恰亞諾夫理論鋪陳較為完整的一本著作。因為德文版 *The Theory of Peasant Economy* 問世後，引起許多學者批評討論，恰亞諾夫對這些批評意見的回應和申論，都可在《農民經濟組織》中讀到。讀者通過這本書，大致上可以掌握他主要的理論體系。

比起主流經濟學各家，恰亞諾夫並不是一直受到注意。二十世紀的學界可說出現了三段熱衷恰亞諾夫理論的時期。首先是一九二〇至三〇年代，隨著恰亞諾夫的著作被歐洲所知，曾經引發一陣不小的爭議。但在這之後，直至六〇年代以前，恰亞諾夫幾乎被遺忘。一九六二年恰亞諾夫理論再度被引介，自一九六〇年代起即形成一股「恰亞諾夫熱」。恰亞諾夫受歐美學者極度的推崇，《農民經濟組織》的英譯本、《恰亞諾夫選集》和其他重要著作的英、法、荷等語文的譯本，都相繼應運出刊。而受他的學說所影響的學門也不限於經濟史，有一些學者更嘗試應用他的理論，研究前工業化的歐洲、開發中國家、二次戰後獨立的殖民國家或先史時代的社會。² 同時，在這股「恰亞諾夫熱」的潮流中，掀起人類學家的形式主義論者（Formalist）與實體主義論者（Substantivist）論爭，恰亞諾夫被歸為後一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³ 恰亞諾夫地位的第三度回升是在一九八〇年代的俄國，個人著作、恰亞諾夫之子的回憶錄以及各種紀念著述等，絡繹不絕地出版。⁴ 一九九九年英國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雜誌更出版專號，翻譯恰亞諾夫一九二〇年代在歐洲行程中所寫的四十封過去從未

息見：秦暉，〈當代農民研究中的「恰亞諾夫主義」〉，中譯本《農民經濟組織》（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代中譯序〉，頁1-2，以及1966年英譯本的Preface和Bibliography of A. V. Chayanov, pp. 287-288。

² 秦暉，〈當代農民研究中的「恰亞諾夫主義」〉，見蕭正洪譯，《農民經濟組織》，〈代中譯序〉，頁1-3；金雁，〈恰亞諾夫與當代西方農民學〉，《史學理論》1989年第4期，頁128；Basile Kerblay, "Peasant Family Economy in the USSR today," in E. J. Hobsbawm... et al. ed., *Peasant in History: Essays in Honour of Daniel Thorner* (Calcutta: Published for Sameeksha Trust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69.

³ Nicola Tannenbaum, "Chayanov and Economic Anthropology," in E. Paul Durrenberger ed., *Chayanov, Peasants, and Economic Anthropology* (Orlando, Florida: Academic Press, INC., 1984), pp. 29-30.

⁴ 秦暉，〈當代農民研究中的「恰亞諾夫主義」〉，頁3。

被刊登的信件，為瞭解恰亞諾夫的思想建構歷程提供了珍貴的材料。⁵

相對於歐美，中國經濟史的研究群當中，除了黃宗智和部分大陸學者以外，台灣地區的學人似較熟悉英美學統，對俄國學統不太注意，更不用說是恰亞諾夫了。⁶ 基於此點（以及筆者理論素養的貧瘠），本文現階段僅以「介」為主，而「評」的部分則是整合前人的看法。此處將先簡略交待恰亞諾夫的生平和學術背景，再就本書內容舉要介紹，最後是回顧恰亞諾夫理論的應用研究。

二、恰亞諾夫與組織生產學派（the Organization and Production School, or Neo-Populists）

與恰亞諾夫學問有關的背景可歸為二項：一為俄國十九世紀中後期以來具理想色彩、主張走入民間的民粹主義知識分子的傳統；另為俄國一八

⁵ 該雜誌 1970 年代刊登許多研究恰亞諾夫的文章，最早為 1975 年 Mark Harrison 介紹恰亞諾夫的農民經濟學，隨後就是 1976 年專號刊登恰亞諾夫著名的烏托邦小說 *The Journey of my Brother Alexei to the Land of Peasant Utopia* 的英譯文。見 Terence J. Byres, "Editor's Introduction",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26. 4 (July 1999): 1-5.

⁶ 據筆者所見，台灣方面介紹恰亞諾夫理論的文章，可在《經濟學百科全書》第七編《人力資源、資源經濟學、農業經濟學》（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 年）中「小農制度」條內（頁 2438-2439）找到，但此後似乎少有相關訊息出現。相對之下，大陸學界顯然較積極，最早的介紹文章為徐建青，〈恰亞諾夫《農民經濟理論》簡介〉，《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 年第 4 期，頁 117-156，是根據 1966 年英譯本而寫；後有金雁，〈恰亞諾夫與當代西方農民學〉，刊於《史學理論》1989 年第 4 期，頁 128-135；秦暉，〈農民、農民學與農民社會的現代化〉，見《中國經濟史研究》1994 年第 1 期，頁 127-135；又，秦暉，〈當代農民研究中的「恰亞諾夫主義」〉，為《農民經濟組織》中譯本的序，頁 1-25。另外，黃宗智的著作中也有恰亞諾夫（譯為蔡雅諾夫）理論的介紹和引用，見黃著，《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年），頁 4-5；以及《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年），頁 5-7。金雁、秦暉皆聲稱，中國至目前仍是全世界農民數佔高比例的國家，瞭解既有的農民學傳統也是應該的。相對照之下，早已登進已開發國家水平、進入後工業社會的台灣，學者即使研究中國經濟史，也多半著眼於商人、商貿議題，較少關照農村經濟課題，這種現象似乎也是一種想當然爾的遺憾。

六一年解放農奴制後設立的地方自治局及其農民研究資料庫。前者成員包括大學生、醫務人員、教師、經濟及統計學者，其革命民粹主義運動在一八八〇年代結束後，基於要改造俄國需先研究農民的想法，許多知識分子相繼轉入地方自治局從事有系統的、科學化的農村調查研究及統計，形成所謂的「地方自治局農業工作者」。地方自治局在省、縣兩級都有，為半官方半民間機構，國家出資而民間運作，從事築路、土地整理、農業技術改革等務及調查研究工作，研究空氣自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自治局所累積的大量出版品和經驗數據資料，實為當時世界上最龐大的農民研究資料庫。恰亞諾夫年輕時即是自治局的土地調查員，十月革命前師事預算統計學派學者，被視為第三代的自治局農業工作者，並組成組織生產學派。十月革命後，擁護蘇維埃政權的新民粹主義分子極為活躍，恰亞諾夫即是新民粹派知識社群的理論發言人，主張發展農民的村社合作制。一九二七年以後蘇聯農業集體化制度加速進行，對恰亞諾夫一派的批判逐漸升溫。終於在一九三〇年爆發「勞動農民黨」案，組織生產學派的主要成員均被指控為反革命分子而入獄，新民粹派分子隨即銷聲匿跡，而恰亞諾夫則在一九三九年死於勞改營。直至一九八七年，官方才正式為「勞動農民黨」冤案中包含恰亞諾夫在內被鎮壓的十五名學者平反。⁷

前面提到的兩個背景，實指十九世紀後期以來俄國農業的變遷和知識分子、農業專家投入農業改造的歷程，也可說是組織生產學派的形成背景，這在《農民經濟組織》〈導言〉中恰亞諾夫有清楚的自述。他提到，十九世紀後期民粹主義者曾經針對俄國的農業問題（諸如農業命運、農業中的資本主義發展、農民分化及無產階級化等議題）提出論述，引發了與

⁷ 同樣都持有「回到民間」的理念，新民粹主義與民粹主義的差別在於：後者主張給予農民土地與自由才是解決農業問題之道，強調農業問題乃是財產關係；而前者認為應該是重組農民經濟、找到增加農民勞動生產的組織原則、投入科學化技術、土地改良等。秦暉，〈當代農民研究中的「恰亞諾夫主義」〉，頁 6-8；金雁，〈恰亞諾夫與當代西方農民學〉，頁 129-130、135；Basile Kerblay, "A. V. Chayanov: Life, Career, Works," in Daniel Thorner, Basile Kerblay, and R. E. F. Smith ed., *A. V. Chayanov on the Theory of Peasant Economy* (Madison,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6), pp. xxv-lxxv.。

馬克思主義者的論戰，雙方都對農民農場產生興趣。進入二十世紀，俄國的農民農場與市場、商品生產的關聯迅速增強，提供農民農藝科技諮詢指導的組織也日漸增多。而深入農村的農學家、合作制推行者和統計學家，面對諸多實際的農村問題，開始注意農業生產組織。

恰亞諾夫認為，由農業生產組織切入而發展出來的農民農場理論，並不是組織生產學派唯一處理的論題。該學派成員所涉略的還包括農業區域專業化、農場的簿記分析和家計調查、經濟作物與家庭手工業、農業信貸制度的功能、農業合作社理論、推廣及指導農民農藝等等。以這些實務工作為基石，有關農民農場組織問題的大量經驗材料日益累積，以及從這些材料歸納的事實經過與歐洲農場性質比較之後，發現無法用農企業組織理論加以解釋。他所說的經驗事實，是指以下諸般現象：（1）十九世紀末俄國一位農學家推廣改良農具（脫粒機）遇到阻力，發現新機具不但使農民勞動力在冬季閑置，而且由於新機具性能年年折舊使農民總收入未增反減。（2）二十世紀初俄國學者已提出「消費地租」理論，指出地少的農民為了消費需求的壓力和避免失業，支付的地租往往高於農企業型的地租。（3）勞動密集型作物（亞麻）由於可以吸納更多勞動力和減少失業，反而在地少的農民地區得到推廣。（4）農戶耕地擁有量與手工業收入成反比關係，而農業和手工業並兼對農民較划算。（5）與英國比較，俄國的工資水平與糧價的關係呈反比變化（英國為正比關係），合理的解釋為：歉收年糧價上升，農民光靠農業無法維生而以雇工進入勞動市場，結果勞動供給過多使工資水平下降。（6）家計調查顯示農場勞動力並未充分利用，且農場總生產水平會影響勞動強度的提高。基於這些現象，研究者不得不選擇忠於經驗事實，另尋新的解釋框架，農民農場理論才得以建構起來。

整體而言，組織生產學派強調的是：有需要藉由一系列基本的農技，例如使用化肥、牲畜品種篩選、合作社等西式改良方法，以轉變傳統農民農業的生產組織。正是這種傾向，使其與民粹主義者和馬克思論者大相逕庭。⁸

⁸ Basile Kerblay, "Chayanov And The Theory of Peasant as a Specific Type of

三、恰亞諾夫的農民經濟理論

《農民經濟組織》一書的章節為：

導言

第一章 農民家庭及其發展對經濟活動的影響

第二章 農民家庭勞動力的自我開發程度與勞動農場中的有利概念

第三章 農民農場組織的基本原則

第四章 農民農場的組織計劃

第五章 勞動農場的資本

第六章 家庭農場組織特點產生的國民經濟後果

第七章 成為國民經濟體系組成部分的家庭農場及其可能的發展形式

其中，第一、二章為本書的主要論述，強調勞動要素如何成為農民農場經濟的決定要素；第三、四章細密鋪陳農民農場組織的內部運作原則、計畫；第五至七章探討以農民農場為主的個體經濟在整體國民經濟（national economy）中的地位，討論地租、地價、市場利息及資本各經濟因素對農民農場的影響，同時提出未來農民農場的發展形式。作者除了縝密勾劃自己的理論之外，還不時將其理論與歐美資本主義視角的農企業理論對照區別。至於他人的批評，作者則在〈導言〉中開門見山有系統地一一回覆。據此，筆者將本書要旨析分為三個部份來談：第一，農民農場（family farm）、家庭人口週期與勞動消費均衡理論（the labor consumer balance theory），這是恰亞諾夫農民經濟理論的核心論述，被認為是他畢生最具代表性的貢獻；第二，以農民農場為主的個體經濟與整體國民經濟的關係；第三，回應學術界的各種執疑。

(一) 農民農場、家庭人口週期與勞動消費均衡理論

農民農場，或家庭勞動農場，指的是農場家庭在全部運用自家勞動力而不使用雇傭勞動的情形下，透過全年勞動以獲得收入的一種組織形式。⁹ 其中，所謂的收入不是指農場的農業生產 (agricultural output)，而是指農業勞動以及全部家庭手工業和商業的總收入 (joint income)。另外，土地、技術等生產要素，或市場的影響，都是要透過勞動力加以結組才能顯現其意義。就這個角度而言，勞動力的資源、結構和勞動積極程度完全由家庭結構（或家庭規模）決定，亦即家庭結構決定了家庭經濟活動量 (volume of economic activity) 的上下限。決定上限規模的變數，是指家庭勞動力是否可以發揮最大的勞動強度和利用率，以提供勞動供給；決定下限規模的變數，則是指維持家庭生存所必需的消費需求數量。而所謂家庭結構，則是從家庭不同年齡段的人口結構和人口消長過程著眼，觀察在一個家庭生存週期中，家庭中能夠從事生產的勞動者數量，與消費者數量之間的變動關係。恰亞諾夫這種立論基點，被稱為「生物的決定論」 (Biological Determinism) 解釋模型。¹⁰ 據其模型，家庭形成之初，家庭規模不斷擴大，家庭負擔沈重，因為孩童尚屬年幼不能加入生產行列。所謂家庭負擔，可以用 e/p 值（或 c/w 值）衡量，即家庭消費人數與勞動者人數的比率值，數值愈高表示負擔愈重。而當第一個孩子達到半勞動力的年齡時，家庭負擔開始減輕，這是隨著更多孩子加入勞動家庭而漸漸發生的。其後，若不再有嬰兒出世，而已出生的孩子逐漸成年，家庭將分裂成更多個小家庭，或是由於有兒媳加入使家庭規模擴大等等各種變動。無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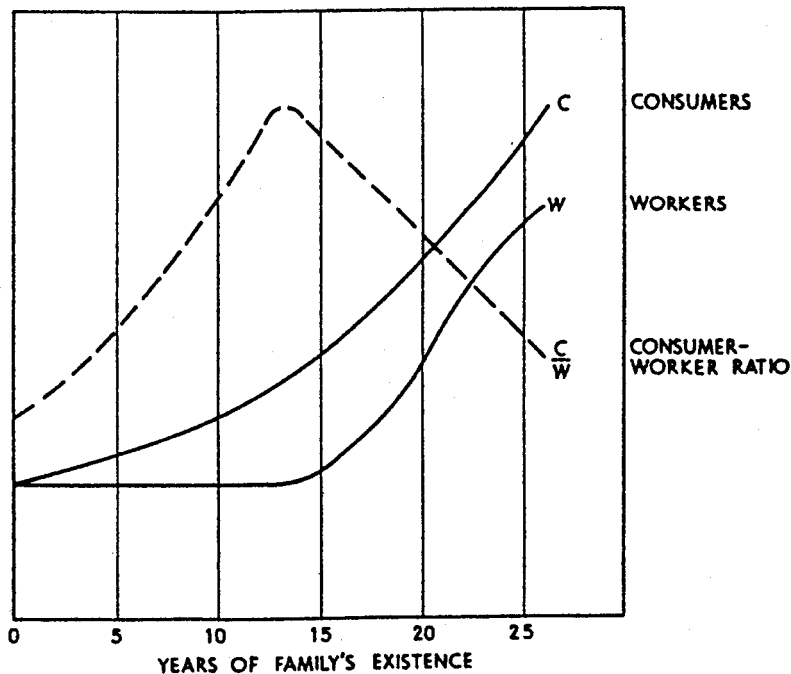
⁹ 農民農場，英譯為 family farm，在歐美一般定義其性質為由家庭所運控而以謀取利潤為主的企業，但恰亞諾夫的定義顯然大大不同。或謂該詞俄文原意為「農戶」，1917年十月革命後的農村存在的是農戶，非農民農場。見秦暉，〈當代農民研究中的「恰亞諾夫主義」〉，頁22；Daniel Thorner, Basile Kerblay, and R. E. F. Smith ed., *A. V. Chayanov on the Theory of Peasant Economy* (1966), "Preface", p. vi.

¹⁰ Teodor Shanin, *The Awkward Class, Political Sociology of Peasantry in a Developing Society: Russia 1910-192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2), pp. 101-109.

表 1：家庭人口結構的變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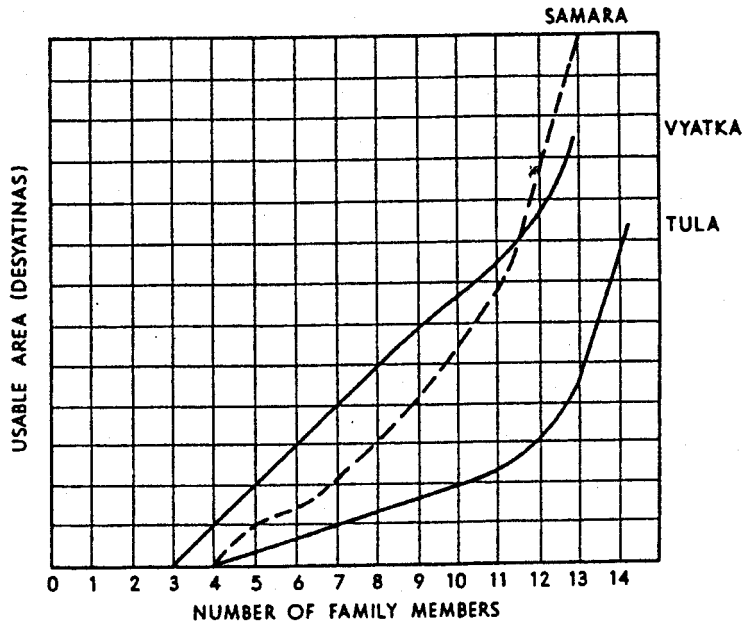
Years of Family's Existence	Married Couple	Children									Total in Family		Consumers + Workers
		1	2	3	4	5	6	7	8	9	Consumers	Workers	
1 ...	1.8	—	—	—	—	—	—	—	—	—	1.8	1.8	1.00
2 ...	1.8	0.1	—	—	—	—	—	—	—	—	1.9	1.8	1.06
3 ...	1.8	0.3	—	—	—	—	—	—	—	—	2.1	1.8	1.17
4 ...	1.8	0.3	—	—	—	—	—	—	—	—	2.1	1.8	1.17
5 ...	1.8	0.3	0.1	—	—	—	—	—	—	—	2.2	1.8	1.22
6 ...	1.8	0.3	0.3	—	—	—	—	—	—	—	2.4	1.8	1.33
7 ...	1.8	0.3	0.3	—	—	—	—	—	—	—	2.4	1.8	1.33
8 ...	1.8	0.3	0.3	0.1	—	—	—	—	—	—	2.5	1.8	1.39
9 ...	1.8	0.5	0.3	0.3	—	—	—	—	—	—	2.9	1.8	1.61
10 ...	1.8	0.5	0.3	0.3	—	—	—	—	—	—	2.9	1.8	1.61
11 ...	1.8	0.5	0.3	0.3	0.1	—	—	—	—	—	3.0	1.8	1.66
12 ...	1.8	0.5	0.5	0.3	0.3	—	—	—	—	—	3.4	1.8	1.88
13 ...	1.8	0.5	0.5	0.3	0.3	—	—	—	—	—	3.4	1.8	1.88
14 ...	1.8	0.5	0.5	0.3	0.3	0.1	—	—	—	—	3.5	1.8	1.94
15 ...	1.8	0.7	0.5	0.5	0.3	0.3	—	—	—	—	4.1	2.5	1.64
16 ...	1.8	0.7	0.5	0.5	0.3	0.3	—	—	—	—	4.1	2.5	1.64
17 ...	1.8	0.7	0.5	0.5	0.3	0.3	0.1	—	—	—	4.2	2.5	1.68
18 ...	1.8	0.7	0.7	0.5	0.5	0.3	0.3	—	—	—	4.8	3.2	1.50
19 ...	1.8	0.7	0.7	0.5	0.5	0.3	0.3	—	—	—	4.8	3.2	1.50
20 ...	1.8	0.9	0.7	0.5	0.5	0.3	0.3	0.1	—	—	5.1	3.4	1.50
21 ...	1.8	0.9	0.7	0.7	0.5	0.5	0.3	0.3	—	—	5.7	4.1	1.39
22 ...	1.8	0.9	0.7	0.7	0.5	0.5	0.3	0.3	—	—	5.7	4.1	1.39
23 ...	1.8	0.9	0.9	0.7	0.5	0.5	0.3	0.3	0.1	—	6.0	4.3	1.39
24 ...	1.8	0.9	0.9	0.7	0.7	0.5	0.5	0.3	0.3	—	6.6	5.0	1.32
25 ...	1.8	0.9	0.9	0.7	0.7	0.5	0.5	0.3	0.3	—	6.6	5.0	1.32
26 ...	1.8	0.9	0.9	0.9	0.7	0.5	0.5	0.3	0.3	0.1	6.9	5.2	1.32

圖 1：家庭生存年數與 e/p 值（或 c/w 值）



何種情況，都將經歷生成、發展階段，而且家庭人口增減的循環週期大約是二十五年。因此，每個家庭形成的時間長短不同，各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成為各不相同的勞動組織。這些推論可以由表 1 和圖 1 呈現出來。¹¹

圖 2：家庭成員人數與耕地面積的關係



勞動既是農民農場的決定性要素，則家庭規模與家庭經濟活動量有何關聯？恰亞諾夫以 E. N. Knipovich 的研究結論（可以圖 2 表示）為基礎，進一步計算家庭規模和家庭經濟活動量的數學關聯，包括農業總收入與生產者人數的相關、農業總收入與消費者人數的相關。此處的家庭經濟活動量，是以播種面積做為測度單位，理由是：（1）農民農場中，手工業、商業和商業性的畜牧業發展得較不理想，而且程度較一致；（2）早期的地方自治局統計人員分析農戶家庭普查時，經常以可耕地面積、播種面積等要素的數據進行資料分組，並發現這些要素能夠用來測度農民家庭經濟活動量；（3）農民農場的勞動和收入雖然具有雙重性，但是針對這種經驗性材

¹¹ 中譯本圖表品質不佳，以下各表圖取自英譯本。

料所做的調查很有限。恰亞諾夫的實證研究認為，無論是在以農場收入為主的地區，或是手工商業極為發達而農業收入居次要的地區，家庭規模和家庭經濟活動量之間都存在高相關性。他解釋這種高相關的含意為：播種面積（或土地利用面積）受家庭規模的制約。

前文曾述及，恰亞諾夫以消費者人數與勞動者人數的比值（ e/p 值或 c/w 值）測度農場家庭的經濟負擔，也就是家庭經濟活動量的上限由家庭勞動力的最大供給限度決定，而由維持家庭生存所必需的消費需求決定其下限。據此， e/p 值或 c/w 值可以看成是家庭消費需求對家庭勞動供給的壓力。當此值上升，農民的「自我開發程度」（或「自我剝削程度」，*self-exploitation*）會隨著提高。所謂「自我開發程度」，是指當家庭的消費需求壓力增加，家庭中的勞動成員為了維持家庭的生存，提高其勞動強度，勞動辛苦程度（或「苦役感」，指勞動者對其勞動負擔的主觀感覺程度）增加，以便開發更大的生產能力。按照這樣的觀點，消費者人數或消費需求，顯然是決定家庭經濟活動量的最主要變數。這便是恰亞諾夫農民經濟理論中有名的「勞動消費均衡理論」，可以由圖 3 的理想模型來表示。

圖 3：勞動消費均衡的理想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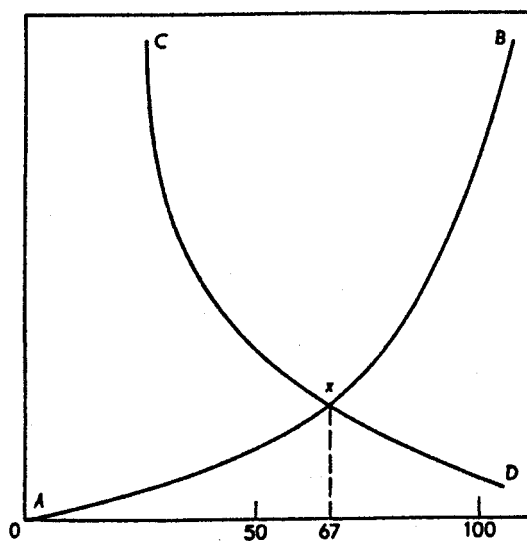


圖 4：按月統計的勞動日長度（Tver 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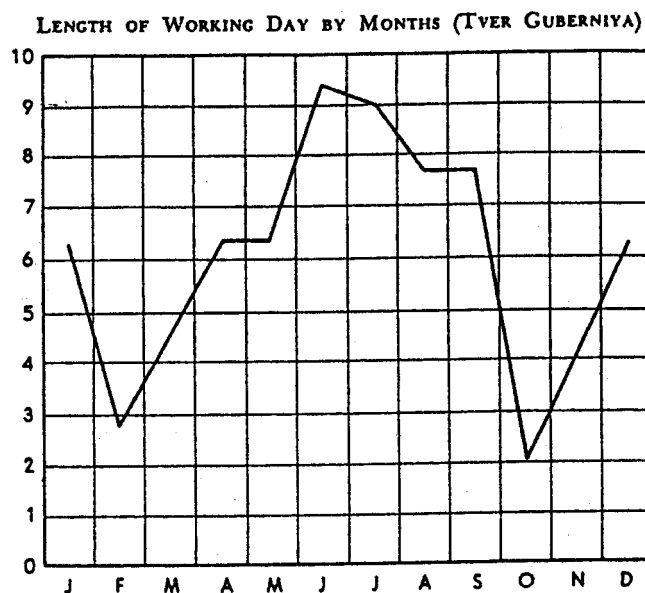


圖 3 中，X 軸表農場主一年所得的價值（以俄幣 rubles 表示），Y 軸表數量。曲線 AB 表示隨著 X 軸所得的價值而付出的勞動辛苦程度，曲線 CD 表示農場家庭對所獲價值的主觀評價的變動，可視為家庭需求滿足程度的變動。這二條曲線之所以如此走勢，與邊際原理有關，恰亞諾夫也因此被定位為奧地利學派的跟隨者。以曲線 AB 而言，當付出的勞動量愈大，其最後一單位勞動的辛苦就愈大（邊際勞動報酬遞減）。曲線 CD 的變動也是同樣的原理，對最後一單位所獲價值的主觀評價是愈低的。曲線 AB 與曲線 CD 相交於 x，表示全年家庭勞動強度和家庭需求滿足程度在這一點上處於均衡狀態。亦即，在年收入 67 盧布的價值上，對邊際勞動收入所獲的主觀評價，與對邊際勞動所付出的辛苦評價相等。曲線 AB 與曲線 CD 具有主觀特性，其變動使 x 點跟著移動。因此家庭農場為達到基本的經濟均衡，總是能在惡劣的條件下改變其勞動強度、降低生活水平，接受很低的單位勞動報酬，以維持生存。

另外，恰亞諾夫也認為，「自我開發程度」就是農民的勞動集約程度，

指農民在一年十二個月中能夠（或想耗費）的勞動能力數量，這是決定農民全年勞動收益差別的因素之一。他根據俄國地方自治局的統計資料所做的分析顯示，農民的勞動跟隨著農作季節而變化，不同季節的勞動耗費不但每天不同，每日亦有顯著的差異，其勞動強度的變化曲線總是大起大落。（見圖 4）而且農民全年的勞動只有較小的比例用於農業，約佔總勞動時間的 25-40%，若再加上用於手工業和商業的勞動，也不會超過 50%。可見勞動的實際強度與勞動的充分利用相差極遠，換句話說，農民農場尚存在可觀的未被充分利用的勞動時間。

（二）以農民農場為主的個體經濟與整體國民經濟的關係

1. 地租、地價、市場利息

恰亞諾夫強調，他是從個體經濟層次分析，是研究農民農場組織的內部運作機制，而這種機制又與資本主義式農場相當不同，但兩者都共存於國民經濟體系之中，各自對相同的經濟因素（諸如地租、地價、市場利息、資本等）做出不同的反應，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與國民經濟體系產生關聯。他認為自李嘉圖以來分析國民經濟的種種理論，其推論依據總是假設經濟人乃是資本主義企業主、在雇傭勞動基礎上經營，然而這種古典經濟學中的經濟人事實上並非都是資本主義企業主，而往往是家庭生產的組織者。因此李嘉圖等經濟學體系的理論較為片面，對於分析複雜多樣性的經濟現實不能勝任。

恰亞諾夫提到，農民農場面對地租、地價、市場利息、資本等經濟因素時，和資本主義式農場的反應不同，他以李嘉圖等人的理論為對照，逐一說明。在地租方面，恰亞諾夫認為地租是真實存在的一個社會經濟現象，隨著社會關係的運動而變化，應當屬於社會經濟分析（social and economic analysis）。但李嘉圖等人則把地租當成農民的一種「非勞動收入」，可在簿記上運算，是一種簿記估價分析（valuation and bookkeeping

analysis)。恰亞諾夫不認為簿記計算能對土地價值做出估價，研究農民農場中的地租問題也不可以只是當成「非勞動收入」的數字問題，而是應該研究地租形成因素對農民農場的影響。他談的地租形成因素，是指土地的質量（地力肥瘠）、土地距市場的位置。地力較好、地近市場都是有利地租形成的條件。對農民農場而言，應該問的問題是：在有利地租條件下，對農民農場有何影響？他認為此種影響只在於創造了更好的勞動利用條件，亦即提高勞動生產率，但並不能使農民農場增加新的非勞動收入來源。¹²

如圖 5 所示， A_1B_1 曲線表示在更為有利地租條件下的勞動辛苦程度，新的均衡點為 x_1 ，表示農民農場用更為有利條件下的勞動取得更多收入以滿足其需求，其結果能夠使勞動總量降低。而且，地租形成因素對兩類農場的作用，若就數字性質來看，恰亞諾夫區分其與李嘉圖等人的差異：前者為勞動生產率的變動，後者為資本主義地租的變動；其中，後者地租的產生又與工資、資本利息及市場價格有關，而農民農場勞動生產率提高的結果則與這些無關，而是促使勞動強度降低、家庭福利水平提高、資本累積能力增強。以圖 6 來說， AMB_1 是引入地租後的變化， x 為無需支付地租時的均衡點， x_1 為需支付地租 20 盧布時的新均衡點， x_2 為需支付地租 40 盧布時的另一新均衡點。在 x_1 時，需求滿足度提高（ $x_1 k_1 < xk$ ）、勞動強度降低，但在 x_2 時，需求滿足度降低（ $x_2 k_2 > xk$ ）而勞動強度增加，顯示農民農場可以支付 20 盧布的地租，但若支付 40 盧布時則不利。據此，存在大量土地的地區，即使農民的純勞動報酬低於資本主義農場的工資，他也會以最優的勞力密集度去經營，他多半能按較低地租租用土地。而在人口過剩的地區，為了達到農場內部均衡，農民不得不提高其勞動強度，甚至遠遠超過最優水平，此際即使農民支付的地租高於資本主義農場的工資甚多，也會覺得值得。

¹² 恰亞諾夫所謂勞動生產率，其含意是指「保證勞動能夠獲得特定生產效果的經濟和技術條件」。

圖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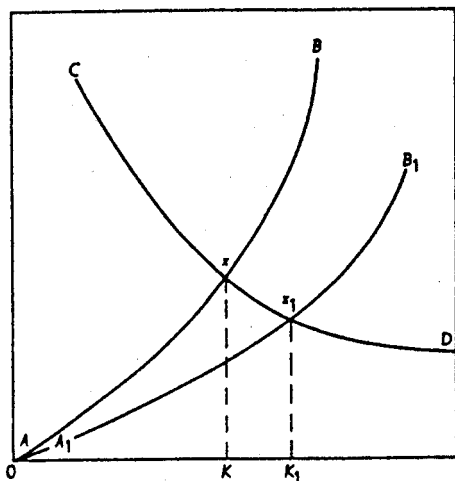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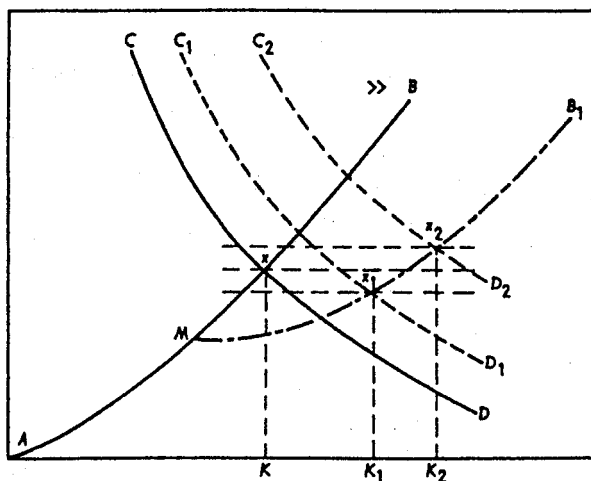


圖 6



對於農民農場為購買土地所能支付的地價的分析，恰亞諾夫認為他的地租分析也可用於地價，不同的是地價數額較大，支付年數可能較長，農民農場經常會有意識地降低生活消費水平。他認為人口過剩區，土地相對缺乏，最窮的農民反而會支付最高的地租和地價。至於利息，農民農場根本不太關注市場利息率，它往往可以為了借入資金而支付很高的利息。因此就資本集約度來看，農民農場往往也有超過資本主義農場的現象，只是農民農場的高資本集約，通常伴隨著更高的勞動強度。

2. 資本

把農民視為農企業經營者的理論當中，資本（有時技術也包含在內）要素被認為是影響產出的重要生產要素之一。對於農民農場的資本是如何形成與更新這個問題，恰亞諾夫也有獨特的見解。他分二個議題來討論：資本累積對農民農場的作用如何、農民農場內部的均衡機制如何決定資本累積的形成。

對於第一個議題，恰亞諾夫首先從家計調查材料中看看農民農場用於消費支出和經營支出（有關用於生產周轉、固定資本等的預付資本，包含

實物及貨幣支出)的關聯。如表 2、圖 7 的經驗數據所示，當家庭福利水平(人均生活消費)提高，資本集約度(*capital intensity*，人均經營支出)也跟著增加，直到人均經營支出約 80 盧布左右。但是在這之後資本累積卻不再增加，經營支出在全部收入中的比重下降，只在這一水平上下波動。恰亞諾夫據此推測：農民農場組織中勞動力與其配備的生產資料(*means of production*)之間存在某種合理的限度。也就是說，在這限度之內，勞動力擁有的資本量的增長都有益於提高勞動生產率，而當資本量達到此一限度時亦即達到勞動生產率的最高值。若踰越這個限度，勞動生產率不會跟著資本量的增長而提高(除非同時有技術變革發生)。

圖 7：Novgorod 省人均經營支出與人均消費支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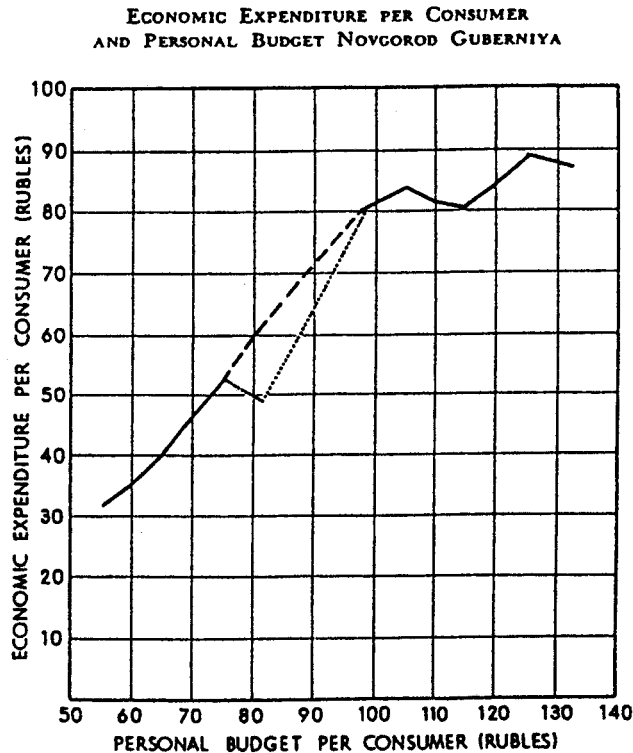


表 2：Novgorod 省的農民支出(盧布)

NOVGOROD BUDGETS (rubles)				
Personal Budget per Consumer	Consumer's Budget	Economic Expenditure		
		Per Consumer	Per 100 Rubles Personal Expenditure	Fixed Capital per Consumer
0.0- 49.0	44.5	27.0	60.8	58.3
50.0- 59.9	55.2	31.9	57.8	72.9
60.0- 69.9	64.7	40.2	64.7	114.8
70.0- 79.9	73.3	53.7	73.3	132.1
80.0- 89.9	84.5	49.3	—	153.0
90.0- 99.9	95.6	79.2	82.8	242.4
100.0-109.9	105.9	85.0	80.3	257.0
110.0-119.9	113.9	81.6	71.7	227.3
120.0-129.9	126.0	88.9	70.5	335.0
130.0-∞	172.4	86.6	50.2	361.0

圖 8-1：有利的資本利用

ADVANTAGEO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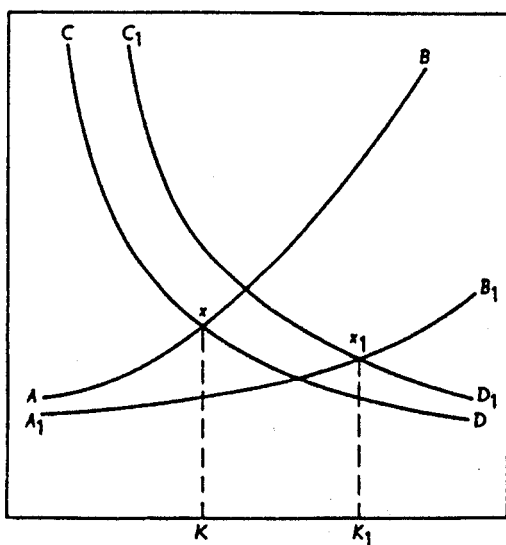


圖 8-2：不利的資本利用

DISADVANTAGEO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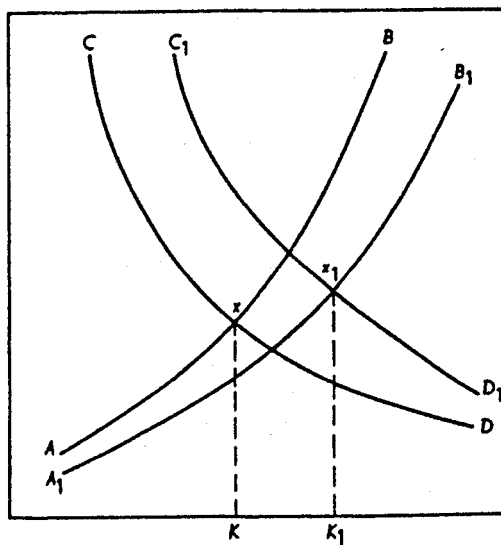


圖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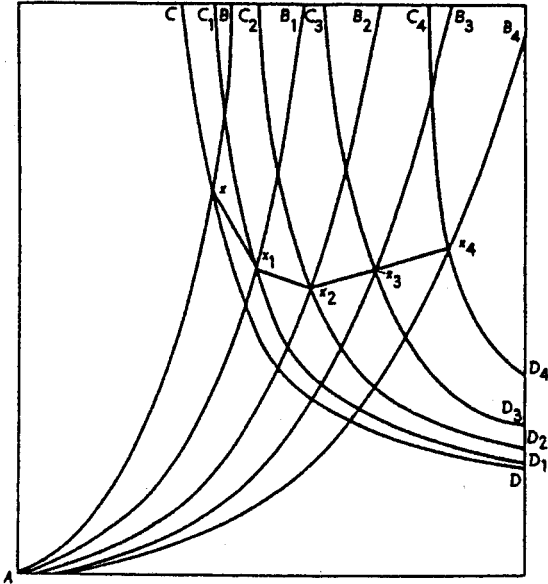


圖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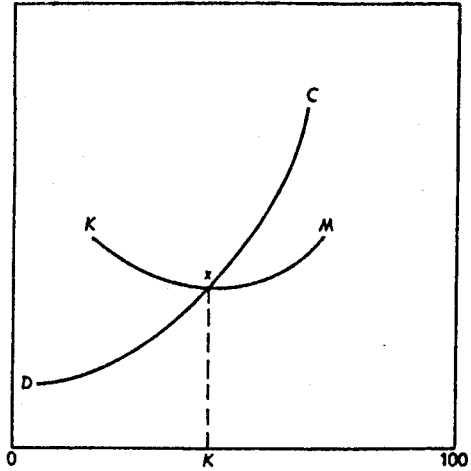


表 2 第 2 欄「消費者人均生活費支出」及第 4 欄「每 100 盧布生活費對經營支出」項的數據表示，經營支出與消費支出是平行的，而且在資本累積未達到最優水平時，年收入中資本的增長率在大多數情形下都超出生活消費的增長率，這顯示消費與資本累積之間有密切的關聯。再按勞動消費均衡觀點，農民農場若有大量基本需求未被滿足時不會限制消費，也不可能顯著增加資本累積；唯有勞動生產率漸漸提高，生活消費不斷增大，使家庭需求獲得滿足，決策者才會從他增加的總收入中撥出部分用於資本累積。因此恰亞諾夫認為，資本累積的數量取決於生活需求滿足程度，與一般認為「生活消費支出隨資本的變動而變化」的推論不同。他進一步說明資本在農民農場基本經濟均衡機制中的作用，如圖 8-1、8-2 所示，為同一資本量二種不同的利用方式。圖 8-1 為有利的情形，邊際勞動耗費辛苦程度更低而消費滿足程度更高。圖 8-2 為不利的情形，邊際勞動耗費辛苦程度提高而消費滿足程度降低。如果在不同的資本集約度條件下，農民農場所實現的基本經濟均衡可以圖 9 表示。圖中， $C_1 D_1$ 和 $A_1 B_1$ 到 $C_4 D_4$

和 $A_4 B_4$ ，代表 I 到 IV 四種不同的資本集約度水平。資本集約度由 0 到 I 再到 II 水平，農場福利水平提高，勞動辛苦程度降低，表示資本集約度的效用大於資本耗費成本，且在均衡點 x_2 已達最優水平，再提高資本集約度的話，會從生活消費中分割更大的分額，得不償失。

至於第二個議題，恰亞諾夫提到，由於農民農場並不是常常可以維持或達到資本集約度的最優水平，因此不得不在生產資料供應不足的情況下勞動，以降低其福利水平為代價實現農場內部的經濟均衡。前文也曾提及：資本累積與消費支出是平行的，農民家庭只在生活消費增加的同時平行地增加資本累積，也就是當總收入增長時資本累積才會增長。然而，農民農場如何分配經營支出與消費需求？這種經濟行為的理論根據可用圖 10 來說明。假設年總收入為 1000 盧布，CD 曲線為對生活消費支出的評價，KM 曲線為對生產支出（從未來消費效用來看的資本累積）的評價，均衡點 x 為經營支出 400 盧布。若農場第一年經營支出低於 400 盧布時為有利（邊際勞動耗費辛苦程度更低而消費滿足程度更高），但到第二年為了維持經濟均衡、將大大提高勞動辛苦程度、降低消費滿足程度。

3. 部分與整體

儘管農民農場有其不同於資本主義個體經濟的特性，它還是屬於國民經濟體系的一部分，那麼它是如何產生變化，以什麼樣的紐帶形成整體的？恰亞諾夫認為，農場規模的擴大和分裂，主要因素為來自農場家庭內部的人口消長變化。若按播種面積大小劃分農場組別高低的話，農民農場的規模極其多樣化，從小型到大型農場都有。他提出五種農民農場的運動趨勢：下降、上升、水平、分化、以及伴有水平等形式變動的上升運動。圖 11 顯示，由於經濟條件不利，抑制年輕家庭的擴大，農場經營失敗者增多，較低組別農場數量增加，形成「一般性下降運動」（或「一般福利水平的降低」）。當市場形勢有利時，年輕家庭的擴大較迅速，農場發展趨勢甚於衰敗趨勢，因此經過一段時期後較高組別的農場數量將會增多，稱

圖 11：下降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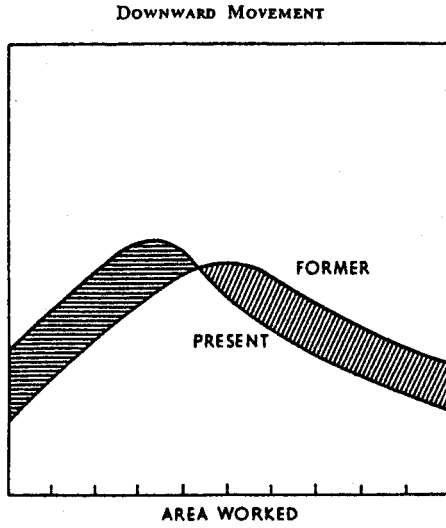


圖 12：上升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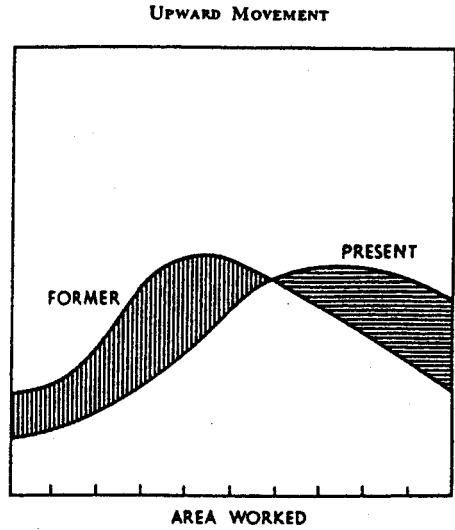


圖 13：水平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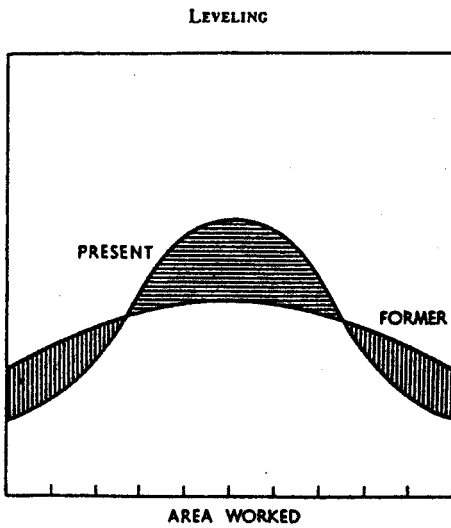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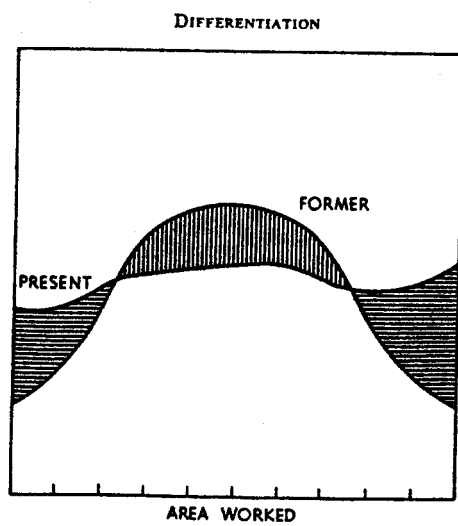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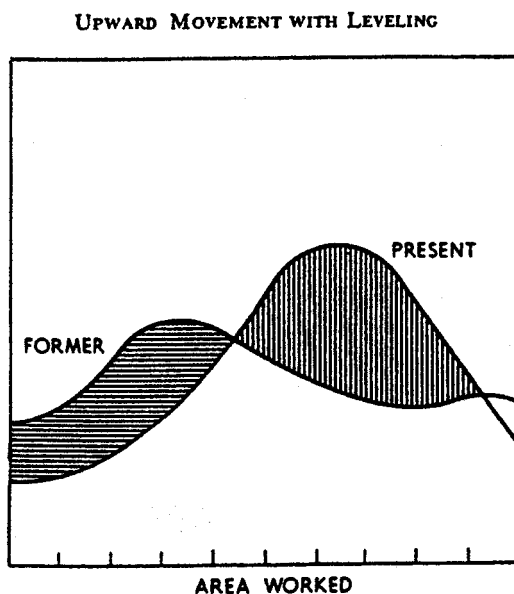


圖 14：分化運動



為「一般性上升運動」如圖 12 所示情況。實際的農場調查數據也顯示，當年輕家庭農場的經濟能力從較低組別上升到中等能力組別的同時，也有規模較大但已經老化的農場普遍進入分戶析產的過程，如此便形成最高組別農場數量減少而中等組別農場數量增加，為圖 13 所示的「水平運動」。不過，如果重大的經濟危機相當程度地削弱發展中的年輕農場的經濟實力，而大型農場又表現出較強的穩定性的話，則會發生兩極分化的情況，中等組別的農場相對減少，產生如圖 14 的「分化」運動。最後，包含著上升而伴有水平、下降及分化的複雜情況也有可能發生，如圖 15 的變化。無論農民農場歷經何種運動趨勢，恰亞諾夫強調的是家庭內部的人口因素，因此主張促使農村發生分化的因素，不在於社會因素，而是人口分化（農民農場家庭規模的升降變化）。

圖 15：伴有水平等形式變動的上升運動



另外，由於受到資本主義經濟的影響，俄國農村也存在雇傭勞動，只是資本主義式農場尚未造成席捲之勢，使用雇傭勞動的農場佔全部農場數

的比例還小。不過，農業顯然已捲入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中，這是資本主義經濟透過貿易聯繫使分散的農民農場結組起來，將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滲透到農村，進而使每個農企業成為世界經濟的組成部分。從貿易聯繫來看，分散的農民農場就是經由密切的商業關係——農村集市體系，形成國民經濟整體。在貿易聯繫複雜的市場體系中，貿易機構為了商品質量的標準化，往往積極插手農民的生產過程，最後形成「縱向的資本主義一體化」(vertical capitalist concentration)。然而恰亞諾夫認為，農民農場未來發展的可能形式，不一定是以雇傭勞動為基礎、大生產單位的資本主義農場，他提出「第三條道路」——採合作制形式的農業縱向一體化。¹³ 前述「縱向的資本主義一體化」中，集中領導農業生產過程的商業、倉庫、水利、信貸、原料加工企業等控制權都在資家手中，而他所主張的農業合作化形式則是由小商品生產者主控，農民自己將生產的一部分交給合作組織。他以西伯利亞農民農場合夥接管乳酪業（原屬於「縱向的資本主義一體化」發展，後因生產過剩及競爭而紛紛倒閉）的例子，說明合作組織成功的可能性。

最重要的是，俄國的主要工業部門如加工工業、採礦業和交通運輸業，都是大型企業，而且國家擁有管理與控制權，為國家資本主義體制。但唯獨農業是由分散的農民農場按其自發的力量形成其社會經濟結構，未受國家控制。恰亞諾夫認為，為了不動搖國家資本主義的穩定機制，同時為了使農業融入國家資本主義體系，有必要對農民農場進行直接控制，而最好的方式就是推行合作制形式的農業縱向一體化，使合作社體系與國家經濟的領導機構結合。

¹³ 「第三條道路」是指既反對資本主義，又不認同史達林模式的社會主義，想在這二條發展道路之外，尋找一條從傳統農民社會到現代化之間最適合俄國的道路。見秦暉，〈當代農民研究中的「恰亞諾夫主義」〉，中譯本〈代中譯序〉，頁6。

(三) 挑戰與回應

在恰亞諾夫生前，當時學術界的批評包括兩方面：(1)方法運用、(2)農民農場類型是否存在於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方法方面，有的評者認為組織生產學派分析問題的方法是「靜止的」，脫離了實際的社會經濟情況，但同時也有人批評恰亞諾夫並未運用馬克思主義方法，而是投入奧地利學派邊際效用理論的旗下。此外，許多學者也認為，俄國已經受到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波瀾的影響，農民農場早已捲入其中，資本主義類型的農場組織將會是俄國農業發展的下一個階段，因此斷言恰亞諾夫所描述的那種農民農場類型實際上並不存在。攻擊言論甚至認為，組織生產學派進一步精心地建構農民農場的意識型態（已受資本主義影響的小生產者意識），並予以美化，從而支持「反動的」前資本主義經濟組織型式。

面對這些挑戰性言論，恰亞諾夫申述其觀點。關於研究方法的爭論，恰亞諾夫認為，組織生產學派並不是將農民農場當成一種國民經濟來研究，而是試圖從組織角度來認識農民農場，瞭解其組織過程的機制，因此不會採用動態的分析方法，只能使用靜態的方法，屬於型態特徵的分析研究。不過，他並不認為組織生產學派在方法上劃地自限，因為學派中人遇到處理國民經濟問題時，就又採用動態分析方法了。對於是否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方法，恰亞諾夫認為他處理的是個體經濟的實際研究，而馬克思主義分析方法向來用於分析國民經濟問題，不但很難應用於農業評估調查、簿記分析，也很難用於企業型式的組織分析。其次，對於投入奧地利學派旗下之說，恰亞諾夫舉出組織生產學派中其他經濟學者的研究為證，認為運用邊際效用原理的行為只是他個人的著作如此，無關整個學派的取向。他並自陳，採用邊際原理實受奧地利學派的早期學者 J. H. von Thünen (1783-1850) 的影響。

至於第二個批評——農民農場類型是否存在於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恰亞諾夫並不否認農民農場轉變為半資本主義農場的現象，也不認為農民農場組織可以長久存在永不消失，但是他認為至少在他所見的未來十

年期間，蘇聯及其他許多國家仍然存在這種特質的農場組織，而且在國民經濟中佔有相當大的比重，這是不可以忽視的事實。而且，他再度強調，他的勞動消費均衡理論雖然模式化了實際生活面，但卻是從大量的農民經濟行為中進行觀察而得來，並非臆造。

此外，對於是否忽略農民農場捲入資本主義商品市場體系的問題，恰亞諾夫辯駁，他並未忽略這個趨勢。在這個趨勢中，農民農場受到金融資本的影響而與資本主義工業並存，或是與資本主義農業並存，農民農場與當代經濟中的各項因素之間，形成了更為複雜的社會關係。不過，他強調雖然農業部門受資本主義的影響增大、生產集中，但是未來不一定導向大地產形式的發展，反而更可能形成這樣的趨勢：商業和金融資本主義對農業中的極大部分建立了經濟控制權，可是農業生產仍然是由小規模的家庭勞動農場來完成。最後是意識型態的問題，恰亞諾夫認為，組織生產學派的學者群畢生從事與農民經濟相關的研究工作，是從農民經濟利益的角度出發，其考察工作從未涉及意識型態，不能指責其為「反動的」一群。恰亞諾夫藉此重申，該學派正在推動的是通過合作制，建設一種具有現代進步技術的新型農村，既不反對農業進步，也不是維護過時經濟組織形式的反動思想者。

四、恰亞諾夫理論的評價與應用

恰亞諾夫生前的各種批評，已如前述，收入《農民經濟組織》中。不過，在他生前提出負面評價者似乎不少，而正面殊榮反倒是他死後的事。Basile Kerblay 認為恰亞諾夫最大的貢獻在於，他的理論能夠綜合農業中決定農業體系發展以及社會關係發展這兩方面的主要因素。例如當時 J. H. von Thünen 和德國歷史學派（The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of Schmoller），分別提出市場、人口密度做為影響農業體系發展的主要因素，恰亞諾夫則把這兩個因素結合到他的理論模型中，為古典及新古典主義的

抽象概括理論與歷史學派之間的空隙架起橋樑。¹⁴ 恰亞諾夫這種兼容各種觀點的態度，Teodor Shanin 也是肯定的，並認為其研究取徑是「從下層」（from below）開始思考農民農業，亦即從農民農場的運作邏輯而非從國家或國際的角度。¹⁵

理論綜合的優點之外，前文提及，「恰亞諾夫熱」時期人類學家把恰亞諾夫奉為實體主義論者的主要代表人物。最早應用恰亞諾夫理論的著作是 Marshall Sahlins 寫的 *Stone Age Economics* (1972)，該書立於實體主義論研究石器社會。¹⁶ 荷蘭學者 J. H. Boeke、G. J. Vink 研究印尼，也是肯定了恰亞諾夫的微觀理論（農民農場組織的內在機制和特性）。¹⁷

在 1984 年出版的一本論文集 *Chayanov, Peasants, and Economic Anthropology* (E. Paul Durrenberger ed., Orlando, Florida: Academic Press, INC.)，就說明了人類學家廣泛地應用恰亞諾夫農民農場、家庭人口週期與勞動消費均衡理論，以檢驗不同社會家戶生產的研究取徑。論文集處理的家戶對象包括法國、瑞典、玻利維亞、斯里蘭卡、中國和台灣等地區，這些應用研究大致肯定恰亞諾夫所說的 c/w 值的變動是家戶生產單位變動的一個源頭，但也指出不同的其他因素如：家戶的調適、貿易對家戶生產動力的影響、國家撥款、輪作制度對勞動供給和價格變遷情勢的適應等等也是重要的。¹⁸ 其中，台灣的個案是以一九七〇年代大甲鎮的七十六個

¹⁴ Basile Kerblay, "A. V. Chayanov: Life, Career, Works," pp. lxiv-lxvii. Basile Kerblay, "Chayanov and The Theory of Peasant as a Specific Type of Economy," p. 151.

¹⁵ Teodor Shanin, "Chayanov's Message: Illuminations, Miscomprehensions, and the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Theory'," in Daniel Thorner, Basile Kerblay, and R. E. F. Smith ed., *A. V. Chayanov on the Theory of Peasant Economy* (1986), pp. 3, 16.

¹⁶ Marshall Sahlins, 山內昶譯，《石器時代の經濟學》（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84 年），〈序論〉，頁 4；秦暉，〈當代農民研究中的「恰亞諾夫主義」〉，頁 22。

¹⁷ Svein Aass, "The Relevance of Chayanov's Macro Theory to the Case of Java," in E. J. Hobsbawm... et al. ed., *Peasant in History: Essays in Honour of Daniel Thorner*, p. 221.

¹⁸ E. Paul Durrenberger ed., *Chayanov, Peasants, and Economic Anthropology*, pp. 13-16.

農戶調查資料為主，檢驗恰亞諾夫所謂存在於資本主義經濟之外的農民經濟的理論是否有效。考察的結果顯示，需求滿足的確決定了勞動集約度，這與恰亞諾夫理論相符；但是大甲農戶的土地擁有大小、家戶大小和收入水平之間的關係又極為微弱，似又不同於恰亞諾夫研究的俄國農場。不過，由於作者認為要檢驗恰亞諾夫理論必需立基於長時段的研究，大甲農村的觀察不是最終的結論，只證明了恰亞諾夫理論有助於農民經濟內在動力的瞭解，但還不能全盤否定其理論。¹⁹

此外，來自中國大陸學者的批評頗具建設性，可歸結為二點。其一，有關農民社會「人口分化」說。論者認為，在市場關係日深的情形下，經濟因素似乎比人口因素更加主導農民分化。而且即使在市場條件不發達的傳統時代，超越人口與經濟的「第三因素」也在傳統社會中有很大的作用，如貴族與平民間的身分等級區隔、習俗主導的統制經濟社會都是。其二，有關小農（農民農場）的生命力和穩定性的解釋。論者認為以勞動消費均衡關係論家庭經濟活動量不太恰當，因為這一理論的前提是俄國村社土地分配制，應該以此制直接解釋農民經濟。²⁰ 這兩點批評很有見地，不過筆者認為「第三因素」說有其道理，但也無法據此否定「人口分化」性質的存在。

無論如何，恰亞諾夫早已搏得歐美學界的高度評價，這或許和以下二點事實有關。第一，若從落後的俄國步向工業化的歷程來看，對於資本主義在俄國漸為增長的重要意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數十年間成為那時當令的論辯熱點。在這樣的脈絡中，用以區辨農民生產（*peasant production*）與資本主義式農業的判準不斷被學者提出來，恰亞諾夫正是其中之一。²¹ 第二，根據 Teodor Shanin 的看法，一九六〇年代的「恰亞諾夫熱」之所

¹⁹ Shu-min Huang, "Market and Nonmarket Factors in Taiwanese Peasant Economy," in E. Paul Durrenberger ed., *Chayanov, Peasants, and Economic Anthropology*, pp. 167, 178-180.

²⁰ 秦暉，〈當代農民研究中的「恰亞諾夫主義」〉，頁 18。

²¹ Daniel Thorner, "Peasant Economy as a Category in Economic History," in Teodor Shanin ed., *Peasants and Peasant Societies*, p. 203.

以蔚為風潮，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到一九五〇年代期間，以現代化理論為導向解決先進國與落後國的發展差距，繼而形成的理論危機和思潮有關。二次戰後面對落後國家與西方國家之間的发展差距，主流理論認為經由以西方先進國為目標的運作，如西方模式的議會、市場、觀念、科技，以及增加資金、教育等投入，落後國家也會經過起飛（take-off）階段，達到能自立而持續的經濟成長。但是到了一九五〇年代，這兩個世界的落差似乎未減反增，「發展的問題」並沒有解決，知識界群起攻擊現代化理論的樂觀假設和方法的錯誤。之後則是悲觀地聚焦於發展瓶頸的討論，用以解釋發展落差，即「未發展的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論。再之後則產生了注重「發展社會」（developing societies）中的主體成員——農民的趨勢。恰亞諾夫理論被引入英語世界，可說與六〇年代「面向農民」（face to the peasants）的思潮轉向有關。²²

上述二點說明了恰亞諾夫時代和六〇年代都在尋找資本主義模式以外的另一條道路。自六〇年代以來，恰亞諾夫理論被高度肯定的意義似乎在於：人們終於發現了可以重新解析「發展社會」（落後國家）的新方法。尤其他的理論當中，農民農場、家庭人口週期與勞動消費均衡理論被應用得最多，特別是經濟人類學領域的嘗試。而八〇年代以來以「後」冠銜的各種主義（以及後現代主義）思潮迭興，對歷史研究的衝擊愈為明顯，否定「大歷史」、「歐洲中心」、理性、科學等主流價值，強調各個文化有其「自己的」發展和特質。據此，二十世紀饒有輝煌成就的新經濟史、向來習用資本主義經濟理論模式的經濟史研究，恐也列於後現代史學攻擊的範疇之中。在這當頭，重拾恰亞諾夫理論，或許可以幫助我們重新思考經濟史新的研究未來！

²² Teodor Shanin, "Chayanov's Message: Illuminations, Miscomprehensions, and the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Theory'," pp. 19-21.